

# 黨的路線與權力鬥爭： 回顧毛澤東以來中共重大路線鬥爭

李福鐘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 摘要

中國共產黨一百年來歷經多次路線更迭，1949年建國證明「農村包圍城市」策略奏效，而此路線代表人物毛澤東，係在延安透過整風手段，取得黨內最高領導權。建國之後，爲了以何種模式推動社會主義建設，中共黨內爆發路線爭議及權力鬥爭，包括是否結束新民主主義及「冒進」與「反冒進」之爭等，埋下了日後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的因子。文革結束後爲了爭奪領導權，中共黨內再次爆發路線之爭。從改革開放路線開始，迄2022年中共二十大前夕，黨內權力鬥爭並不止歇，說明中共作爲剛性革命政黨，黨的路線轉移，終將以慘烈的權力鬥爭爲代價。

關鍵詞：毛澤東、新民主主義、反冒進、鄧小平、習近平

## 壹、前言

中國共產黨即將在2022年秋天舉辦第二十次全國黨代表大會，而在此前，由習近平所領導的黨中央，已於2021年11月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

議〉，<sup>1</sup>成爲中共歷史上繼1945年及1981年後，第三份由中央委員全體會議所通過之重要黨史論述。這份〈決議〉的出爐，連同習近平即將在二十大之後繼續連任總書記，所謂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否將偏離鄧小平所推動的「改革開放」路線？已成爲全世界所有觀察中共政經及軍事發展的研究者深感興趣的議題。

本文試圖回顧中共自1940年代藉由延安整風確立「毛澤東思想」以來，迄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執行「改革開放」政策，分析中國共產黨在歷次重大路線及政策移轉過程中，所必然伴隨的權力鬥爭及人事更迭。此種路線轉移與權力鬥爭相伴隨的現象，依本文看法，肇因於中國共產黨係一擁有布爾什維克血統的剛性革命政黨，在不同政策路線的競爭過程中，不同的權力競逐者對於路線制定、話語宣傳權，以及政策執行三項權力的取得具有強烈之排他性，一旦某一路線被宣稱爲正確，則異己派系及其主張便將立即遭到批判甚至消滅。這在一百年來的中共黨史上，幾乎屢試不爽。

中共權力核心的路線鬥爭，可以說與其黨的歷史相始終。在1921年建黨初期，儘管尚不流行使用「路線」一詞，<sup>2</sup>但事實上已存在黨內不同路線之間的辯論和鬥爭，尤其是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之

---

1. 決議全文，請見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2021年11月1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2. 綜觀中共黨內文件，在1927年召開「八七會議」之前，絕少出現「路線」一詞，批評錯誤路線時所使用者，多爲「主義」，例如對於「機會主義」、「改良主義」的指摘。但到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所通過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路線」一詞已俯拾皆是。出於〈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請見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952-999。

間的對抗。<sup>3</sup>到了1966年文革爆發，毛澤東爲了鬥倒劉少奇，特別提出「兩條路線鬥爭」概念；<sup>4</sup>之後1971年爲了準備向林彪集團發起進攻，毛又拋出「(建黨)五十年大的路線鬥爭算起來有十次」的說法。<sup>5</sup>

本文認爲，不論是「兩條路線鬥爭」或「十次路線鬥爭」，基本上都是毛澤東在文革期間爲搶占話語權制高點而使用的策略，絕非理解中共黨內權力鬥爭與路線辯論之間錯綜複雜的辯證關係的好框架。爲此，最好還是回歸1940年代延安整風確立「毛澤東思想」定於一尊地位開始談起，以便讀者瞭解中共在過去一百年間，路線轉移與權力鬥爭之間何以總是相伴相隨。

## 貳、農村包圍城市

1949年中國共產黨得以擊敗國民黨政權，取得中國內戰勝利，學界基本上已有高度共識，即「農村包圍城市」策略的成功。過去七十年來在這方面的研究，包括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詹軻(Chalmers Johnson)、胡素珊(Suzanne Pepper)、裴宜理(Elizabeth Perry)、薛爾頓(Mark Selden)、戴瑞福(Ralph Thaxton)、陳永發等，<sup>6</sup>

---

3.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一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東亞研究所，1982年），頁94。

4. 毛澤東在1966年10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此一說法後，立即成爲中共宣傳機器「兩報一刊」大肆鼓吹的口號。請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62-165。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394。

6. Benjamin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172-204; Chalmer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71-155; Suzanne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對於中共如何動員、組織農民及取得最終勝利，累積出相當繁複且有實證基礎的論述。儘管在若干細節的討論上，例如中共基層幹部動員農民的方式為何，不同研究者容或有不同見解，<sup>7</sup>但是對於中共係因為建立了強而有力的農村武裝根據地，因而得以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以軍事實力挑戰國民黨政權這一前提，眾人的見解並無二致。

對此，中共歷史上曾有的兩次「中共中央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亦皆不遺餘力予以強調。1945年4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所通過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如此敘述：

毛澤東同志還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就……特別指出農民的土地鬥爭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內容，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因此對於農民鬥爭的領導是中國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務。<sup>8</sup>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 229-330, 429-435;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08-247; 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60-233; Ralph A. Thaxton, *China Turned Rightside Up: 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in the Peasant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60-233;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259-446.

7. 例如戴瑞福出於對毛派農村平均主義及群眾運動理想的憧憬，曾經以「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解釋中共在農村政策上的成功，而陳永發等人則更著重於中共基層幹部在打土豪、分土地過程中的血腥暴力及組織動員。

8. 出於〈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請見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971-972。

如果說 1945 年 4 月由於中共尚未建國，尤其與國民黨的所謂「解放戰爭」尚未開打，因此這一段時間所通過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於「農民革命」的肯定尚顯得有所保留；那麼 1981 年 6 月十一屆六中全會所通過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於由毛澤東所代表的黨內「農民革命」派的推崇，就可說是全無罣礙了：

在黨的許多傑出領袖中，毛澤東同志居於首要地位。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前，毛澤東同志就已經明確指出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鬥爭的極端重要性……。革命失敗後，他是成功地把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在農村保存、恢復和發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多次從危機中挽救中國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給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人民軍隊指明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sup>9</sup>

正如這一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強調的，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sup>10</sup>以前，中共是把注意力放在大城市

---

9. 出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請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99。

10. 在 1945 年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後，中共已定調了一套關於黨史的解釋框架：從 1921 年建黨至 1945 年通過決議的這 24 年間，為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而這一時期的第一階段，即從 1921 年建黨至 1927 年遭國民黨「清黨」的 6 年，稱為「第一次大革命」。出於〈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請見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 952-953。因此 1981 年版〈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稱之「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指的就是該年 4 月

的；要不是靠著毛澤東「把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中國共產黨「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然而像這樣被刻意簡化的敘述，並沒有說清楚究竟是由誰負責的中共中央將政策重心從城市移往農村，也籠統地將 1927 年至 1934 年之間中共黨內複雜的路線鬥爭輕描淡寫帶過。事實上，毛澤東躋身中共權力核心的政治局常委是在 1935 年 1 月的遵義會議，<sup>11</sup> 有關中共中央從城市工人路線轉移至農民革命路線，絕非發生在 1927 年國共分道揚鑣之後那麼簡單，也不是全部功勞都歸於毛澤東。中共在中日戰爭期間的迅速擴張，以及 1945 年至 1949 年間取得國共戰爭的勝利，背後仍有千絲萬縷的其他關鍵因素存在。<sup>12</sup> 中共在建國之後及之前，不斷以官方文件並發動宣傳機器突出毛澤東的重要性，其實是一種造神運動，<sup>13</sup> 這種造神運動雖然有助於創造中國共產黨在人民群眾認知上的絕對神聖性，卻也在建國後中共的政治環境中製造了代價高昂的惡果。

比較準確的歷史敘述，應該是 1933 年 1 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

---

至 7 月先後遭到國民黨「清黨」和「分共」。

11. 關於毛澤東在 1935 年 1 月貴州遵義所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晉升政治局常委，並進入決策核心，是不論中共官方或學界長期以來已有之共識。關於這一點，1945 年中共中央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做了以下之描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於是廣大的反對『左』傾路線的幹部和黨員，都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出於〈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請見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 969。
12. 例如詹鶯就以中國農民被迫或自發的民族主義因素，來解釋中共在 1937 年至 1945 年間勢力的迅速擴張。請見 Chalmer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31-70。
13. 前南京大學教授高華對此有精關的分析，請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年）一書。

因在上海無法立足，<sup>14</sup>轉入中央蘇區瑞金，之後黨中央的工作重點才不得不擺放在農村根據地上。而即使如此，以秦邦憲為首的中共中央進入蘇區之後，爲了奪取政策主導權，分別在福建、江西展開「反羅明路線」鬥爭，試圖以教條式的激進政策，取代原本地方幹部「機會主義右傾路線」。也就是說，當中共中央遷移至農村後，出於奪權和立威的目的，不論農村政策或軍事上的「反圍剿」策略都必須服從中央的理論指導，過去地方幹部自行其是的權宜之計或務實性的做法，必須打掉重練，重新節制在黨中央的號令之下。在這一波「反羅明路線」鬥爭中，受到打壓的其實就是以毛澤東爲代表的原江西、福建等地的蘇區幹部。<sup>15</sup>

日後毛澤東所領導的新權力核心在 1945 年重新評價這段歷史時，係以毛所欽定的「新民主主義」(New Democracy) 理論爲基準，<sup>16</sup>批評秦邦憲的黨中央「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定

---

14. 由於中共中央設在上海的各級機關不斷遭到破獲，大批高級幹部遭到逮捕，因此從 1932 年 10 月開始，中央幹部開始陸續潛赴瑞金。自 1931 年 6 月中共總書記向忠發被捕至中共中央遷入江西蘇區爲止，由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大批幹部遭國民政府逮捕，領導層人事變動極大，除了總負責人（代理總書記）明確係由秦邦憲擔任外，其餘政治局成員組成如何，依據現存中共中央組織史料，亦難以確切說明。如果依據當時在共青團（少共）蘇區中央局擔任重要職務的郭華倫（郭潛）的說法，中共中央在轉入江西蘇區時，臨時政治局成員爲秦邦憲、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陳雲五人，請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二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東亞研究所，1982 年），頁 376。

15. 關於「反羅明路線」對於福建、江西地方幹部的批鬥，以及對於紅軍將領譚震林、蕭勁光的批判，請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二冊）》，頁 378-391；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 年），頁 274-277。

16. 所謂「新民主主義」理論，係毛澤東於 1930 年代後期至 1949 年間逐步形成的一套有關中國共產黨如何領導中國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界限，並主觀地急於要超過民主革命；……主張整個地反對資產階級以至上層小資產階級。」<sup>17</sup>也就是說，在1940年代毛澤東終於完全掌握中共黨內決策大權之後，他透過另闢「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sup>18</sup>的馬列主義理論蹊徑，攻擊已經垮臺的秦邦憲黨中央，同時也批評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陳紹禹），更不用講陳獨秀等歷屆中共領導人。言下之意，毛澤東所代表的才是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毛澤東思想是中共二十餘年革命經驗所認證的真理。

從這個角度觀察，中共歷史上的路線更迭，毫無例外必然伴隨著權力鬥爭和政治批判。一個新的政策路線的提出，必定由新的權力核心所發動；而伴隨新的權力核心取得政權，勢必輾壓已經失勢的舊權力集團。這種輾壓不僅表現在政權的奪取上，同時還表現在思想、理論、路線、政策的重大辯論和重新詮釋上。

---

的階段性論述，其重要基本概念和政策文本，出自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和〈論人民民主專政〉三篇長文，分別收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662-709；第三卷，頁1029-1098；以及第四卷，頁1468-1481。

17. 出於〈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請見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972。

18. 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所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即已開宗明義強調：「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隨後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所作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以及七大所通過之中共黨章，亦皆強調必須將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七大黨章並將之定義為「毛澤東思想」。出於〈中國共產黨黨章〉，請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五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頁115。對於毛澤東思想的綜合論述，請見廖蓋農，《黨史探索——歷史經驗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頁41-44；姚紅主編，《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頁7-9。



1945年由六屆七中全會所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事實上不僅代表著1942年延安整風以來毛澤東思想在中共理論和路線的冗長辯論賽中已經定於一尊，同時毛澤東還以這份決議為斧鉞，逐一凌遲昔日政治對手。當然，這種凌遲並非在1945年中共七大前夕一蹴可幾的，而係1942年整風運動以來，毛澤東擘劃已久的黨內權力洗牌與政敵整肅。<sup>19</sup>

### 參、新民主主義的提出與終結

新民主主義理論是毛澤東1940年1月在延安提出的，它的意思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降的中國歷次革命——尤其以辛亥革命為代表——是由資產階級所領導、目的在於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然而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已經轉變為「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且這種新的民主（主義）革命，已經「變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sup>20</sup>

從1942年延安整風到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正是以這種中國革命特定階段的理論，來攻擊、批判其政治對手，同時證明只有自己才是最能掌握中國現時革命階段和正確路線的唯一領袖。

既然毛澤東已經高屋建瓴指出新民主主義階段的中國革命雖然係由無產階級領導，但是目標卻在於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

---

19.關於延安整風運動對於中共全黨幹部的個人歷史與思想審查，以及毛澤東的地位定於一尊，請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頁393-604；陳永發，《延安的陰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頁69-143。

20.出於〈新民主主義論〉，請見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666-668。

家」。那麼，何謂「各個革命階級」？從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到1945年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再到1949年6月的〈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對於「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或「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得包含哪些階級逐步提出了解答，他最終的定案是：

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sup>21</sup>

在這四類可以遂行「專政」的人民中，民族資產階級是最後才被納進來的。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民族資產階級尚未被納入未來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構成基本部分，而是作為統一戰線的拉攏對象。必須到1949年〈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發表後，民族資產階級才被毛澤東納入成為可以一起共享「專政」的階級之一。這一演進，事實上與1947年之後中共軍隊開始占領大城市有關，<sup>22</sup>1933年中共中央離開上海之後，中共幹部熟悉的革命根據地全在農村，農村裡應該如何打土豪、分土地，中共從中央到基層都有長足的學習訓練。然而城市地區則是截然不同的生態，如何維持城市經濟生活與工商產業的正常運作，中共建黨以來並未有過類似經驗。

---

21. 出於〈論人民民主專政〉，請見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475。

22. 1947年11月晉察冀野戰軍占領了河北省會石家莊市，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在12月1日召開的晉察冀野戰軍幹部會議上稱：「這是很大的勝利，也是奪取大城市之創例。」出於〈打下石家莊的意義和經驗教訓〉，請見朱德，《朱德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220。

因此 1949 年 6 月，毛澤東把所謂「民族資產階級」納入成爲未來可以共同實行專政的人民群眾，出發點還是在於緩和中共政權與全中國私營工商業者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全中國數以百萬計的私營工商業者，可以在「民族資本家」的大帽子下繼續維持其企業或商店的營運。中共在農村鬥爭地主的做法，還不打算立即適用於對付城市裡的大小工商企業主。

當然，這樣的政策依然符合現階段中共的新民主主義路線。新民主主義並非社會主義，尚無需對所有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進行公有化。這一點亦反映在 1949 年 9 月由重新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所通過之《共同綱領》上。《共同綱領》在 1954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施行以前，曾經過渡性地扮演基本法的角色。《共同綱領》序言開宗明義指出：

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而以工農聯盟爲基礎，以工人階級爲領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sup>23</sup>

然而共產黨畢竟不可能與資本家永遠攜手合作，那麼，這個所謂的「新民主主義」階段究竟能夠延續多久？毛澤東自 1940 年提出他的〈新民主主義論〉之後，事實上從未真正說清楚講明白，只有 1949 年在河北省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給黨內所有中央委員們這樣的提示：

---

<sup>23</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頁 1-2。

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儘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而是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sup>24</sup>

至於所謂的「相當長的時期」究竟有多長，毛本人從未給過承諾。1950年3月中共中央統戰部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各中央局、分局、中央黨政機關及工、青、婦等群眾團體的代表共93人與會，<sup>25</sup>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在會上演講表示：

現在到處都有人問：「到底什麼時候實現社會主義？」……我們與資產階級是繼續合作下去，還是同它搞翻？……（政治局會議上）大家都還是說搞社會主義要十五年左右。那麼在這期間，總還要跟資產階級搞團結合作吧！<sup>26</sup>

按照周恩來的描述，1950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已經對這個問題有共識，即新民主主義約莫還要持續15年，也就是說，等到1965年左右再進入社會主義。

然而毛澤東的個人心意，往往足以全盤推翻政治局原有之共識或決議。1951年至1952年發生的「三反」、「五反」運動，<sup>27</sup>讓毛澤東

---

24.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431。

25. 中國統一戰線全書編委會編，《中國統一戰線全書》（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頁355。

26. 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一卷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13-214。

27. 「三反」與「五反」運動，起因於1951年11月間中共中央東北局、華北局、西南局幾份有關各地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問題的檢討報告，尤其是華北局對於天津地委前後任書記劉青山、張子善的貪污案調

對原本只是權宜之計的「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策略，產生了不可逆轉的不信任感。毛在建國前所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已經提醒過：「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砲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前要打敗仗。」<sup>28</sup>而「三反」與「五反」的爆發，正代表著資本家正嘗試使用糖衣砲彈腐化共產黨。

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毛澤東在聽取有關第一個五年計畫的相關報告後，做出以下指示：

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後才開始過渡。<sup>29</sup>

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總理周恩來勢必出席了9月24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卻似乎並未將毛澤東的提點放在心上，他在一個月後（10月25日）接見民主黨派和民族資產階級代表陳叔通、章乃器、盛丕華、苗海南、傅華亭、陳經畬等人時，竟然還是表示：

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時間說得那麼準，馬克思主義不是劉伯溫的「推背圖」。……現在談「獻廠」，不僅做不到，而且會發生大的偏差。將來要和平、愉快、健康地進入社會主義，使每個人都能各得其

---

查。而其結果，則是對中國私營工商業者展開全面性的批鬥。事件經過，請見李福鐘，《世紀中國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臺北：三民書局，2018年），頁107-124。

<sup>28</sup>出於〈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請見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438。

<sup>29</sup>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頁213。

所，我們要做很好的安排。<sup>30</sup>

周恩來當天接見這批黨外人士，尤其是民族資本家代表，用意顯然在於安撫剛經過「五反」風暴的私營工商業者情緒，因為已經有私營資本家在飽受驚嚇之餘，提出「獻廠」主張，由政府來收歸國有。但這明顯不符當時中共「利用資本家」的政策，亦非《共同綱領》第26條所規定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原則。<sup>31</sup>

然而，毛澤東從1952年起，顯然對於允許私人工商企業繼續營運失去耐心，除了該年9月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程外，該年年底由政務院財政部主導的新稅制，亦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財政部長薄一波在1953年6月至8月召開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遭到批判和處分，財政部長一職改由鄧小平擔任，而總理周恩來則受到不點名批判，並在隨後的中央政府改組中被削奪大半權力。<sup>32</sup>毛澤東之所以對薄一波所規劃的新稅制火冒三丈，係因為新規定將私營工商業者所需繳納的營業稅和所得稅，與國營企業看齊，而原本國營企業及供銷合作社減徵或免稅的優惠，則遭到取消。<sup>33</sup>簡言之，這個由財政部主導、政務院放行的新稅制，基本精神

---

30. 出於〈團結民族資產階級，發展國民經濟〉，請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經濟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122-126。

31. 《共同綱領》第26條除強調「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外，同時還認可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對於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該條文內容，請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頁7。

32. 有關1952年底至1953年上半年因為新稅制所爆發的政治風暴，請見李福鐘，《世紀中國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142-152。

33. 有關1952年12月31日由政務院財經委員會頒布的新稅制規定，請見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編，《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彙編（1952）》（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年），頁125-139。

就是「公私一律平等納稅」，<sup>34</sup> 看毛澤東眼裡，從周恩來到薄一波，心態上仍停留在照顧民族資本家，完全沒跟上他準備往社會主義過渡的腳步。

在 1953 年的中央政府人事懲處中，實際負責黨中央及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雖未受到明顯波及，然而毛澤東依然在該年 5 月 19 日下令劉少奇與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sup>35</sup> 也就是說，未經與毛澤東討論便放行這個政策的劉少奇，仍在某種程度上受到訓斥。

眼見毛澤東公開表達對劉少奇的不滿，1953 年下半年中南海因此發生了一場駭浪驚濤的權力鬥爭。政治局排名第七的高崗認為有機會可以挑戰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權力地位，因此聯合中央組織部部長饒漱石發起向劉、周的政治攻擊，最終毛澤東選擇犧牲高、饒，讓劉少奇和周恩來繼續主持黨政工作。此即著名的「高崗事件」或「高饒事件」。<sup>36</sup> 高崗事件的發生，說明即使在中共建國初期，領導層尚未出現嚴重路線分歧，然而出於對路線解讀和政策期程的不同理解，配合原本即存在一定緊張關係的權力高低位階，中共內部還是存在隨時可能發生政爭的風險。這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布爾什維克式剛性革命政黨的宿命，此點還將在後文加以補述。

對毛澤東來說，朝向社會主義邁進的最重要憑藉，就是國營企業的持續壯大。1949 年中共建國之初，私營工業產值在全中國占比高達 48.7%；1950 年到 1951 年這個數字持續維持在 38.1% 至 38.4%

---

34.〈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稅制〉，《人民日報》，1952 年 12 月 31 日，版 1。

3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年），頁 229。

36. 有關高崗事件，概括經過請見李福鐘，《世紀中國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 152-155。

之間，<sup>37</sup> 也就是說，在「五反」運動發動之際，純粹的私營工業依然影響著全國近四成的工業產值。在所有被納入統計的工業經濟類型中，<sup>38</sup> 國營工業必須等到 1952 年年底才成長至占全國工業總產值 41.5%，而同一時間私營工業占比下降至 30.6%。<sup>39</sup> 不妨說，這樣的形勢逆轉，讓毛澤東從 1953 年起，開始有足夠的底氣要求黨內所有官員跟上他的腳步，朝向社會主義改造邁進。

最終，中國私營工商業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在 1956 年初迅速完成，不論是否心甘情願，所有的私營工商企業主在這一波全國社會主義改造風潮中，紛紛讓自己的企業或店面行號「公私合營」，實質上等於收歸國有，所有大大小小的資本家，僅以結算後的個人資產「入股」原本自己的家族產業，定期領取股息。中國共產黨僅用了 6 年多時間 (1949-1956)，便消滅了全中國的私營工商企業。所謂的新民主主義，不論在 1940 年代至 1950 年代初曾被中共如何再三保證，中共建國後未曾試行多久，便遭廢棄。

#### 肆、農業集體化、「反冒進」、「大躍進」

中國共產黨對於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除了城市地區的私營工商業外，另外還有農村的農業生產集體化。中共建國後，迅速在全中國農村地區進行土地改革（土改），將地主及富農的多餘土地平均分配給貧農、僱農。然而「分田單幹」型的小農經濟畢竟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小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在毛澤東決定提早結束新民主主義

---

37. 中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頁 194-195。

38. 按當時中國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分類項，除私營工業與國家所有制工業（國營工業）外，尚有「集體所有制工業」、「公私合營工業」、「個體手工業」。

39. 中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4)》，頁 194-195。



階段的鞭策下，農業集體化被中共認定為完成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由之路。

只不過，要在全中國 100 萬個自然村全面推行集體耕作，<sup>40</sup> 談何容易，至少，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就主張速度放慢，不應過於急躁。<sup>41</sup> 然而毛澤東的看法是農民生產積極性很高，那些抱怨缺糧的，都是地主、富農、富裕中農，毛澤東認為反對加快組織生產合作社的意見，都是「資產階級藉口糧食問題向我們進攻」，他還指責中央農村工作部一天到晚叫嚷有些合作社辦不下去是「發謠風」。<sup>42</sup>

毛澤東對於鄧子恢，以及在鄧子恢背後撐腰的劉少奇的反擊，是 1955 年 10 月召開的七屆六中全會，這次全會與會中央委員共發言 248 篇，全部一致擁護毛澤東有關農業合作化必須加速進行的總結報告，鄧子恢則在會上對中央農村工作部的缺失做了自我批評，承認思想上「右傾」。<sup>43</sup> 同時，劉少奇也在七屆六中全會上做自我批評，他如此承認錯誤：

幾年以前，我也有過一種想法，以為在土地改革後，除開普遍發展勞動互助組以外，大約還要過一些時候再來普遍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因而對於當時已經出現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沒有認真地加以研究和提倡，

---

40. 1953 年 10 月陳雲在全國糧食會議上提到當時中國有 100 萬個自然村，出於〈實行糧食統購統銷〉，請見陳雲，《陳雲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210。

41. 關於鄧子恢的看法，請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 328-329。

4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 371-372。

43. 王丰，〈鄧子恢與「四大自由」〉，《中共黨史研究》（北京），第 6 期，1995 年 6 月，頁 72-74。

這是不對的。<sup>44</sup>

毛澤東則在10月11日全會閉幕當天，發表他的總結報告〈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他在這篇總結報告中宣稱：

我們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目的，是要在農村這個最廣闊的土地上根絕資本主義的來源。……農業合作化使我們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基礎上，而不是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基礎上，鞏固了同農民的聯盟。這就會使資產階級最後地孤立起來，便於最後地消滅資本主義。<sup>45</sup>

毛澤東既然在七屆六中全會下達「消滅資本主義」的攻擊令，因此從北京開始擴及到其他省市的「全行業公私合營」浪潮，在短短幾個月內便終結了全國的私營企業，也就不難理解。然而受到中全會「批判右傾保守」氣氛的影響，國務院各部開始制定好大喜功的經濟計畫，各省市地方領導亦層層加碼，要求中央加大基礎建設的投資，最終逼得周恩來、劉少奇出面踩煞車，因此出現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一文。這篇社論被認為是周、劉聯手反對毛澤東的「冒進」政策，也就是所謂的「反冒進」。<sup>46</sup>當毛澤東收到這篇社論的審閱稿時，他批了三個字：

---

4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頁345。

45. 出於〈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請見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頁196-198。

46. 有關1955年底到1956年6月中共高層的「冒進」與「反冒進」衝突，請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521-538。另外，資深澳洲中共史專家泰偉斯 (Frederick Teiwes) 和孫萬國 (Warren Sun) 所合著的《災難路上的中國》一書，亦對「反冒進」至大躍進與

「不看了」。<sup>47</sup>1958年1月南寧會議召開，當時「反右」運動方興未艾，毛澤東再次主導黨內政策話語權，他在會議上大發雷霆，點名批評了許多黨政高層領導人，包括周恩來、陳雲、薄一波等人。當提到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時，他說：「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我為什麼要看？」<sup>48</sup>

可以說，從1956年上半年的「冒進」與「反冒進」之爭，到該年9月中共八大召開，由劉少奇所主導的黨代表大會在政治報告部分內容和從黨章中刪掉「毛澤東思想」，一連串的事件顯然讓毛澤東極不愉快。<sup>49</sup>而扭轉這一情勢的，是1957年的「反右」鬥爭。在「反右」發起之後，毛澤東念茲在茲的階級鬥爭又再度成爲中共中央主要路線，1957年9月在北京召開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毛澤東在會議閉幕式上發表了〈做革命的促進派〉演講，他在演講中說：

---

大饑荒做了相當詳細的描述，請見 Frederick C. Teiwes &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Armonk: M. E. Sharpe, 1999), pp. 1-376。

4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538，毛澤東1958年1月在南寧會議重提此事，他回憶說批的是「不看」兩個字。

48. 有關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砲火四射，讓中共高層人人自危的情形，請見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頁218-220。

49. 馬若德 (Roderick MacFarquhar) 對此有相當細緻的描寫和分析，請見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26-38, 99-121。對於1956年中共八大前後的中南海政治情勢，尤其是八大修改黨章刪除「毛澤東思想」一事，是否種下毛、劉不合的遠因，中共官方一直有不同的解釋。有興趣瞭解中共官方詮釋的讀者，請見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運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一書，尤其該書第五章，頁303-368。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八大」的決議沒有提這個問題。「八大」決議上有那麼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提法是不對的。……革命已經轉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幹的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這是尖銳的階級鬥爭。<sup>50</sup>

就在八屆三中全會毛澤東重新以階級鬥爭奪回發言權後，才有接下來 1957 年 12 月與 1958 年 1 月的兩次杭州會議、南寧會議、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以及 3 月的成都會議等。在這一連串會議上，毛澤東要求從中央到地方的所有黨政官員重新提高認識，批判「反冒進」。毛在 1957 年年底的杭州會議上說：「批評右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評愈高興，要愉快地批評右傾保守。」在這場會議上，周恩來遭指名道姓的批判。<sup>51</sup>1958 年 1 月底於北京召開的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他「超英」的構想，他說：

十五年趕上英國，我看完全可能。十五年就看今年開始的這五年，第二個五年計畫就看前三年，三年就看頭年，頭年就看頭月。<sup>52</sup>

---

50.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 475。

5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 636-637。

5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頁 43-44。

至於毛澤東為「超英」訂下的經濟指標，則是15年後（1972年）鋼鐵年產量要達到4,000萬公噸、煤產5億噸、發電量4,000萬瓩。<sup>53</sup>為了達成此目標，毛澤東要求：「要鼓足勇氣，力爭上游，現在是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火，要講不斷革命。」<sup>54</sup>

經過毛再三鼓吹，從1958年初起，從中央到各省，無不修改原本較為務實的計畫指標，層層加碼，以至於最後完全失控，演變成1959年之後的大躍進與大饑荒浩劫。

## 伍、兩條路線鬥爭

回顧1949年中共建國以來，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乃至於整體黨政高層所形成的權力生態及路線制定，毛澤東一直嘗試扮演鞭策其他黨內同志朝向社會主義目標大步邁進的角色。1949年起實施的新民主主義，是他1940年在延安創造的理論，他利用這套理論駁斥與清算了長征以前的黨內對手，同時也利用這套理論，讓中共在建國初期得以和民族資本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維持短短幾年的蜜月期，以緩和建國初期對於城市經濟的衝擊。

然而毛澤東對於新民主主義事實上是缺乏耐心的，他也不準備忍耐資產階級太久，尤其在「五反」運動之後。因此1953年12月毛澤東正式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向全黨及全國正式宣告：「在我國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社會主義因素和非社會主義彼此鬥爭著。……非社會主義因素將不斷受到限制、改造直至消滅。」<sup>55</sup>雖然這一份提

---

53事實上，1957年中國鋼鐵產量才535萬噸，15年後要達到4,000萬噸，表示每年必須以接近15%的速度成長。

54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 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46。

55出於〈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鬥爭——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請見中共中央文

綱也說明：「要完成這個任務，大約需要經過三個五年計畫，就是大約十五年左右的時間」，<sup>56</sup>但是在毛澤東鼓吹下的全黨動員模式，遵循的往往是超前完成任務模式，除了少數頭腦清楚的中央決策官員或地方領導外，大多數想搏取毛主席關愛眼神的各級官員，莫不鼓足幹勁，力求及早完成任務。1956年初對所有私營工商業進行無差別公私合營是如此，1956年上半年響應毛澤東號召「多快好省」掀起社會主義高潮也是如此，直到劉少奇、周恩來眼看經濟計畫無法執行，下達「反冒進」指示，才暫時避免情況失控。然而劉、周的抵制，反而引來毛澤東更大的反撲，1958年之後毛澤東自命為「躍進」，用以反駁劉少奇等人對他「冒進」的指控。由於1957年「反右」鬥爭對於黨內巨大的衝擊，高舉「階級鬥爭」、「不斷革命」大旗的毛澤東重新掌握話語權，1958年起，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子恢等務實派官員只能偃旗息鼓，萬馬齊喑，讓堅持不管是冒進或躍進的毛澤東大展身手，結果換來經濟巨大損失與生靈塗炭。

由上綜述，不難看出自1953年上半年新稅制事件發生之後，中共決策高層事實上已經隱約分裂為兩種思維，一邊是主張穩步前進的務實派，另一邊則是大肆宣揚社會主義高潮即將來到，並誇大人民群眾積極性的冒進派。這兩種思維第一次正式交鋒是1955年至1956年的「冒進 vs. 反冒進」，第二次交鋒則橫跨1957年的反右鬥爭至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反右鬥爭證明毛澤東「不斷革命」理論的正確性，並證明了劉少奇所主導的中共八大決議內容：「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就表明，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

---

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697。

56. 出於〈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鬥爭——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請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頁702。

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是錯誤的。<sup>57</sup>爲此，毛澤東特意在1958年5月召開中共八大第二次會議，以全國黨代表大會的規格，火力全開批判「反冒進派」，亦即務實派。劉少奇在會上做自我檢討，承認：「反冒進損害了群眾的積極性」，至於實際執行工作的周恩來、陳雲、薄一波、李先念，除了在小組會議上不斷受到批判，同時必須做自我批評。<sup>58</sup>中共建黨一百年來召開過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但同一屆全國黨代表召開第二次大會，八大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然而大躍進最終並未證明冒進派是正確的，反而讓念茲在茲要掀起「社會主義高潮」、「躍進」的毛澤東灰頭土臉。1961年工業總產值比1960年下降超過40%，<sup>59</sup>日常生活必需品嚴重短缺，各地商店貨架空空如也。原本1961年5月爲緩和大躍進災難而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已經將該年度鋼鐵產量指標調降到1,100萬噸，然而3個月後（1961年8月底）在廬山再度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鋼鐵產量指標繼續調降至850萬噸。<sup>60</sup>最終該年鋼鐵產量爲870萬噸，比1960年下降53.4%；原煤產量下降30%、棉布產量下降43%，<sup>61</sup>輕重工業同時重挫。

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正式稱謂爲「擴大的中央

---

57. 出於〈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請見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頁809。

5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頁641-642。

59. 這是劉少奇在1962年1月27日「七千人大會」上公開承認的數字，出於〈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請見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358。

60.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頁13。

6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899。

工作會議」），是劉少奇為終結以毛澤東為首的冒進派，最具企圖心的一次作為。會議基本上將全中國縣級領導以上的基層幹部都召集到北京，以統一政策和思想。劉少奇在會上重申他於1961年5月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對大躍進「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定調，<sup>62</sup>只不過，或許出於顧慮到毛澤東也在會場，<sup>63</sup>劉少奇對於大躍進的負面評價明顯收斂許多，<sup>64</sup>甚至用了不少篇幅稱讚：「成績還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而且從頭到尾言必稱「毛澤東同志」，顧足了毛澤東的面子。

但是毛澤東有真心認錯嗎？多年後江青說了實話，文革爆發後的1967年4月12日江青曾說：「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時憋了一口氣。」<sup>65</sup>同年2月3日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時的說法則是：「（七千人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

---

<sup>62</sup>1961年5月21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是劉少奇所領導的務實派針對大躍進進行檢討的第一次重要會議，劉少奇在會上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出於〈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的辦法〉，請見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頁337-338。

<sup>63</sup>事實上，劉少奇在作這篇長達近100頁的報告過程中，毛澤東還不時插話，雖然並非反駁，而只是提出個人看法。《劉少奇選集》在編輯過程中，將毛澤東的插話全部嵌入劉少奇的演講稿內，出於〈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請見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頁349-443。

<sup>64</sup>有興趣的讀者不妨逐字比較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以及他在隔年1月27日「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兩篇演講分別收錄於《劉少奇選集（下卷）》，頁335-348及頁349-443。

<sup>65</sup>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281。



了。」<sup>66</sup> 也就是說，即使經歷了大躍進及大饑荒的災難，毛澤東仍然認為劉少奇以修正主義，企圖篡奪中國共產黨所堅持的正統馬克思主義。

到這裡，我們大致可以歸結中共建國以來黨內務實派與冒進派的根本差異，儘管雙方均相信社會主義道路，然而前者基本上屬於技術官僚導向，堅持按步就班，依照計畫經濟的規則辦事。儘管被毛澤東形容為「小腳女人」、右傾保守主義，甚至是右傾機會主義，但是務實派更重視數字上的實證性，而非憑藉主觀意願無限上綱，急於求成。

然而在整個毛澤東時代，以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子恢，甚至是鄧小平等人為代表的務實派，始終難敵毛澤東以個人意志和權威介入經濟領域決策。在 1949 年建國之初，毛澤東主要忙於軍事、鎮反、土改，以及政治領域工作，財經決策交由中央書記處劉少奇、周恩來及陳雲等務實派官員決行。但是在 1952 年「五反」之後，毛澤東朝向社會主義前進的鞭策力道愈來愈強大，以毛為首的冒進派逐漸建立起一種論述，即在工農群眾之間普遍存在著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如果忽視這種積極性，甚至抗拒這種積極性，就是路線錯誤，就是右傾。

不妨看看中共黨內務實派精神領袖劉少奇如何看待「群眾積極性」這件事，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演講中如此批評「群眾運動」：

有些同志，把群眾運動當作是群眾路線的唯一方式，好像不搞群眾運動就不是群眾路線。這種看法，顯然是不正確的。更錯誤的是，有些同志，把敲鑼打鼓、虛張聲勢、開一些沒有內容的大會、做一些空洞的大報告，看成是群眾運動和群眾路線。其實，這種形式主義的東西，絕不是真

---

<sup>66</sup>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 281。

正的群眾運動，更不是群眾路線。這種所謂「群眾運動」，往往並沒有真正的群眾基礎，而是在強迫命令的情況下進行的，表面上似乎轟轟烈烈，實際上空空洞洞。<sup>67</sup>

反觀毛澤東的冒進派，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最擅長的不就是「敲鑼打鼓、虛張聲勢、開一些沒有內容的大會、做一些空洞的大報告」？從務實派與冒進派自1949年以來在路線、決策、工作執行上的差異，以及雙方爭搶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導權的過程來看，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就是冒進派的最終反撲，劉少奇在意識形態的戰場上，最終還是敗下陣來。

## 陸、後文革時代與改革開放

1976年9月毛澤東死後的第一場路線鬥爭，是華國鋒為首的「凡是派」與鄧小平為首的「元老派」之間對於黨權的爭奪。在此之前，則先發生了一場關鍵性政變，即中共副主席華國鋒聯手國防部長葉劍英，於該年10月6日一舉逮捕江青集團（「四人幫」）成員。隔日，政治局通過決議，推選舉華國鋒繼任黨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華國鋒生於1920年，中日戰爭期間於老家山西省加入中國共產黨，比起鄧小平、陳雲這些出生於清光緒年間、建黨初期即成為黨員的所謂「第二代」領導人來說，不論年齡或黨齡都小了十幾年。華國鋒之所以能在毛澤東死後成為繼承人，據說是靠著1976年4月30日毛澤東寫給華國鋒的一張便箋：「你辦事，我放心」。<sup>68</sup>除此之外，在周恩來死後，毛澤東放棄了王洪文與張春橋，選擇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及繼任國務院總理，都說明華國鋒確實是毛澤東死前

---

<sup>67</sup>出於〈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請見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頁404。

<sup>68</sup>〈偉大的歷史性勝利〉，《人民日報》，1976年10月25日，版1。

匆促欽定的接班人。

在毛澤東死後，華國鋒在政治上能夠仰賴的，是長年擔任中共中央警衛團團長、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以及文革期間不屬於江青集團，亦不屬於林彪集團的一些省部級幹部和大軍區司令員，例如陳錫聯、吳德、紀登奎、余秋里、郭玉峰等人。這個名單，嚴格來說份量是不夠的。至於軍中耆宿葉劍英，雖然曾和華國鋒聯手逮捕四人幫，卻不見得必須在不久之後的「凡是派」與「元老派」鬥爭中繼續支持華國鋒。因為葉劍英自己也屬於「元老派」，他和鄧小平、陳雲等人的關係淵源，明顯更深於華國鋒。

華國鋒之所以被稱為「凡是派」，乃因為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所謂「兩報一刊」）聯合刊出的一篇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在結論一段出現這樣的語句：

毛主席的旗幟，就是勝利的旗幟。毛主席在世的時候，我們團結戰鬥在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下。現在，毛主席逝世了，我們更要高高舉起和堅決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sup>69</sup>

因為其中出現了兩個「凡是」，因此華國鋒及其支持者們遂被不久之後企圖班師回朝的元老派戲謔為「凡是派」。然而戲謔歸戲謔，從這樣的文宣還是可以看出，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事實上並沒有自己的路線、理論，甚至口號，毛澤東死後將近半年，出現在《人民日報》上的語言依舊是文革模式的套話和空話。所謂堅決擁護的毛主席指示究竟是什麼？另外，文革十年所形成的亂局和殘局該如何收拾？

---

<sup>69</sup>〈學好文件抓住綱〉，《人民日報》，1977年2月7日，版1。

華國鋒並未能提出令人期待的方針。<sup>70</sup>

更耐人尋味的是，華國鋒的髮形長期以來都是像軍人一樣的平頭，然而在1977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28週年國慶當天，《人民日報》頭版將新的華國鋒官方照片與毛澤東的遺照並列，兩人儀態、表情，尤其是髮型，竟出奇地相似。很明顯華國鋒將其頭髮留長，向後梳，使自己看起來更神似偉大領袖毛主席。

然而神似毛澤東並不能真正鞏固華國鋒的權位，當時駐在北京的匈牙利通訊社記者代內什(Balaqi Daineishi)就注意到一個怪現象：從1976年10月6日逮捕四人幫到1977年7月為止，長達10個月中中共中央一直沒有召開中央委員全體會議。這對於政局劇變之後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是很不尋常的狀況。<sup>71</sup>原因在於，元老派向華國鋒施加壓力，要求讓因為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下臺的鄧小平復出。<sup>72</sup>鄧小平一日不平反，在中央委員會擁有足夠實力的元老派就足以讓華國鋒無法順利推動黨務。

最終華國鋒只能選擇讓步，在1977年3月的一場中央工作會議

---

70. 泰偉斯和孫萬國在2011年所發表的論文中，事實上對於華國鋒的經濟發展計畫給予頗高的評價，但是泰偉斯和孫萬國在結論中亦同意：華國鋒的弱點事實上不在於他的政策，而在於比起鄧小平與陳雲，華國鋒在黨內輩分實在太低，只不過是個1938年入黨的所謂「三八式幹部」。請見 Frederick C. Teiwes & Warren Sun, "China's New Economic Policy Under Hua Guofeng: Party Consensus and Party Myths," *The China Journal*, No. 66, July 2011, pp. 1-23。

71. Balaqi Daineishi 著，闕思靜、李葉譯，《鄧小平傳》(*Deng Xiaoping*) (香港：南粵出版社，1988年)，頁174。

72. 所謂「四五」天安門事件，係因1976年3月19日起有民眾自發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以悼念周恩來為名張貼大字報、詩詞，影射和攻擊四人幫。事件最後以軍警在4月5日凌晨鎮壓收場。概略經過，請見嚴家其、高舉，《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頁780-835。

上，華國鋒承諾「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同時還承認「四五」天安門事件的合理性。<sup>73</sup> 爲了善意回應華國鋒的妥協，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寫了一封宣示效忠的信給華國鋒，鄧小平在信中聲稱：「我完全擁護華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和工作的布置。……我對偉大領袖的導師毛主席對我的批評和教導再一次表示誠懇的接受。」<sup>74</sup> 就這樣，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終於在同年7月16日召開，在這次中央委員全體會議上，鄧小平恢復了黨的副主席、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以及解放軍總參謀長等多項職務。這些頭銜，都是1976年4月他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失去的。隨著「四人幫」垮臺和華國鋒的讓步，鄧小平又重回北京政壇，成爲地位僅次於華國鋒的黨內第二號人物。

就在鄧小平恢復權位的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向所有中央委員提出：「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我認爲，毛澤東同志倡導的作風，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對我們黨的現狀來說，我個人覺得，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特別重要。」<sup>75</sup> 從這一刻開始，鄧小平逐步部署以「實事求是」反擊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以「平反冤假錯案」挑戰華國鋒所繼承的文革包袱。<sup>76</sup> 而充當

---

<sup>73</sup>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421。

<sup>74</sup>這封信並沒有收錄於《鄧小平文選》中，但臺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所出版的《匪情月報》曾加以披露，請見鄧小平，〈鄧小平致華國鋒信〉，《匪情月報》，第26卷第9期，1984年3月，頁86。

<sup>75</sup>出於〈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請見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43、45。

<sup>76</sup>有關1977年7月以後至1978年下半年所謂的「真理問題標準」的辯論，以及胡耀邦在1977年12月接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後所展開的平反冤假錯

鄧小平在理論上反擊華國鋒的大前鋒，是1977年3月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sup>77</sup>

在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華國鋒最重要的支持者汪東興被免除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吳德則因必須為「四五」天安門事件負責，在10月即已被免除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職務。在這次中全會上，有四人獲補選進入政治局，分別是陳雲、王震、鄧穎超與胡耀邦。陳雲更是立即成為政治局常委。元老派不僅在中央委員會議，同時在政治局內都占了上風。<sup>78</sup>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公報上除了正面肯定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辯論，同時還對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正式的官方批評：「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加以總結，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是必要的……。」<sup>79</sup>

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之後的中共十一大上，華國鋒曾經聲稱：「歷時十一年的我國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幫』為標志，宣告勝利結束了。」<sup>80</sup>然而僅僅過了一年又四個月，「勝

---

案行動，限於篇幅，本文不作詳述，有興趣的讀者，請見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等相關著作。

77. 當時中央黨校校長為華國鋒親兼，第一副校長則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事實上兩人並不實際掌理校務。

78. 關於1976年至1978年華國鋒的起落，美國著名中國研究者傅高義(Ezra E. Vogel)在其為鄧小平所寫的傳記中，有相當篇幅的介紹，請見傅高義著，馮克利譯，《鄧小平改變中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12年)，頁271-349。

79. 出於〈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請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頁1-14。

80. 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

利結束」一下子風雲變色成爲「缺點」和「錯誤」；而「歷時十一年的我國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日後也在鄧小平欽定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變成十年文革、十年動亂。從這裡，再一次說明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歷史的詮釋權，涉及到當權者的路線定位，也涉及到權力核心的合法性。每一次的權力鬥爭，都必須重新確認路線的正確性，因而必須重新修訂、詮釋黨的歷史，若非如此，則無以驗證當前政策的不容置疑，也無從指揮整個黨機器往單一目標義無反顧前進。這幾乎已成了一種周而復始、百年輪迴的過程，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作爲一個剛性革命政黨，其最高權力核心在路線制定、決策，以及宣傳話語權三方面的絕對排他性。就因爲排他，所以每一次的路線重新確認，都注定出現勢不相容的權力鬥爭；而由路線、決策、話語權三者所建構並代表的權力結構，除非再次經歷一場凶險驚怖的路線辯論與人事傾軋，否則亦無從替換。

這個命定的輪迴過程，從 1935 年遵義會議開始，到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爲止，四十多年時間，屢試不爽。

## 柒、從鄧小平到習近平

概括而言，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主軸，在於經濟上「吸收資本主義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來發展生產力」、<sup>81</sup>「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後的地區」。<sup>82</sup>但是政治上，仍堅持共產黨領導，尊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 1979 年 3 月鄧小平宣布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頁 30。

81. 出於〈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請見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149。

82. 出於〈拿事實來說話〉，請見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155。

他著名的「四項基本原則」的背景。<sup>83</sup>

這樣的路線擇定，似乎注定必然招來「左」、「右」兩方的夾擊。意識形態上仍信仰社會主義的中共黨內諸多高層官員，即使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已定調改革方針，依舊對在農村放寬「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的做法十分不滿，質疑這是企圖「解散社會主義集體經濟」。<sup>84</sup>另一方面，追求思想鬆綁甚至政治改革的異議分子，尤其是年輕世代學生，亦從1978年及1979年之交的「北京之春」開始，持續挑戰中共政治容忍度的底線，歷經整個1980年代而不歇，終於在1989年釀成震撼全世界的「六四」天安門事件。<sup>85</sup>

「六四」事件雖在軍事鎮壓下逐漸平息，然而中共黨內堅持「左派」路線的部分領導人，尤其是政治局成員姚依林、宋平、李錫銘等人，在元老陳雲、王震的撐腰下，對於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不滿亦來到另一個高點。除了政治上「左派」勢力啓動對於改革開放路線的質疑和挑戰外，1989年至1990年間的經濟成長數字，亦給鄧小平帶來另一面向的擔憂。1988年中國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DP)成長率高達11.3%，而1987年同樣高達11.1%；但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

---

<sup>83</sup>關於「四項基本原則」，出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請見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164-176。

<sup>84</sup>1979年3月15日刊登在《人民日報》的一篇署名「張浩」的讀者投書，即提出這一質疑。據曾在趙紫陽執政時期擔任政策幕僚的陳一諮透露，這一「張浩來信」事件，背後主導者事實上就是負責農業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王任重。請見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頁33-34。關於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直到1980年上半年，中共高層對於農村政策的路線對抗，請見李福鐘，《改造一個共和國》（臺北：稻鄉出版社，1993年），頁74-81。

<sup>85</sup>相關概述，請見李福鐘，《世紀中國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335-355。



後，1989 年全年經濟成長只有 4.3%，1990 年更來到 3.9% 的低點。<sup>86</sup>

爲了確保改革開放路線得以持續，尤其是經濟與產業環境的改造和升級，鄧小平選在 1991 年及 1992 年春節前後兩度「南巡」，一方面是透過南方省份的官媒向北京喊話，同時也鼓勵沿海及長江流域省份加大投資力道。鄧小平在兩次南巡期間多次要求停止「姓資」與「姓社」的爭論，他強調：「市場也可以爲社會主義服務」、<sup>87</sup>「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sup>88</sup>

由以上簡述，可以看到即使在 1979 年之後的改革開放時期，以鄧小平的權力與地位，要保護既有政策路線不受影響，依然時時要防範來自不同陣營的挑戰。而在這個複雜且詭祕的權力抗衡過程中，必須時時毋忘維護決策權、宣傳話語權，以及路線制定權三者所形成的權力結構之穩定性，否則一不小心，就會像 1986 年底發生的學生運動，甚至是 1989 年春天的全國性民主運動，都差一點讓鄧小平「政左經右」的改革計畫戛然而止。也就是說，即使自 1979 年以來改革開放路線看似履險如夷地執行了 40 年，卻並不意味過程中未出現黨內權力與意識形態之爭。這一階段的黨內權力爭鬥，表面上固然不若文化大革命的血腥和戲劇化，但較之 1950 年代「冒進」與「反冒進」路線之爭，以及大躍進結束後在 1960 年代初期以農村「四清運動」爲戰場的毛、劉對抗，<sup>89</sup> 其凶險詭譎的程度，完全不遑多讓。尤

---

<sup>86</sup> 相關數據，請見中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9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3 年），頁 31。

<sup>87</sup> 出於〈視察上海時的談話〉，請見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367。

<sup>88</sup> 出於〈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請見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375。

<sup>89</sup> 從 1962 年 2 月「七千人大會」閉幕至 1965 年農村「四清」運動結束前，毛澤東和劉少奇持續在農村政策上纏鬥較勁，相關過程請見李福鐘，《世紀中國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 219-230。

其 1992 年鄧小平南巡期間，即使南方支持鄧小平經改路線的各省、市委書記不乏其人，<sup>90</sup> 但在北京，尤其政治局內，抗拒或觀望騎牆者仍比比皆是。當時的總書記江澤民一度難以抉擇，經過與中央辦公廳主任，同時亦是江澤民長期盟友的曾慶紅密商，才決定給在上海過年的鄧小平打電話拜年，並於 1992 年 2 月 5 日的黨中央春節團拜會上呼籲：「要大膽探索」和「加快改革開放步伐」。<sup>91</sup> 江澤民的表態，成為鄧小平在該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上繼續堅持其經改路線的極大奧援，並因此獲得來自更多地方諸侯的支持和靠攏。

固然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常常被批評為「政左經右」，但並不表示鄧小平不會試圖改變中共黨內的政治環境和權力生態。由於曾親身經歷建國以來殘酷的權力鬥爭，因此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力主推動黨內政治制度改革，強調集體領導、取消黨主席制、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反對個人崇拜，避免再次出現「一個人說了算」的局面。1980 年 8 月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一篇〈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sup>92</sup> 提出包括黨內權力制衡，以及培養接班人隊伍。這一波的制度性改革，當時曾被稱作「庚申改革」。<sup>93</sup>

除此之外，甚至在外交政策上，鄧小平亦配合整體改革開放路線而做出重大調整。鄧小平的主要論據是在 20 世紀結束前，世界大戰不會開打，因此必須爭取利用這一段較長的和平時期，集中精力從

---

<sup>90</sup>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

<sup>91</sup> Robert Lawrence Kuhn 著，談崢、于海江等譯，《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年 1 月)，頁 180。

<sup>92</sup> 出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請見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 320-343。

<sup>93</sup> 阮銘，《中共人物論》(River Edge, New Jersey: Global Publishing Inc., 1993 年)，頁 41。

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sup>94</sup>而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美國、歐盟、七大工業國分別發表了多項對華制裁措施。面對這一局勢，鄧小平在9月4日特別邀集江澤民等6名政治局常委，加上國家主席楊尚昆和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對國際局勢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三句話。<sup>95</sup>之後，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又召見江澤民、楊尚昆、李鵬三人，特別提醒：

第三世界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當頭頭。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但在國際問題上無所作爲不可能，還是要有所作爲。<sup>96</sup>

1991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北韓國家主席金日成時，又說：「現在整個世界的格局還沒定……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主要觀察，少露鋒芒，沉著應付。」<sup>97</sup>

鄧小平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的一連串外交工作指示，在中共內部被歸納爲「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爲」20字訣。<sup>98</sup>

---

<sup>94</sup> 這方面綜述，請見田增佩主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頁1-9。

<sup>95</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1286-1288。

<sup>96</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頁1322-1323。

<sup>97</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頁1332。

<sup>98</sup> 李恒杰，〈論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思想〉，《國際關係學院學報》（北京），第3期，2008年5月，頁1-2。

基本上鄧小平有關黨內人事接班制度、外交工作等的指示，在江澤民至胡錦濤主政階段，都被嚴格遵循。

不妨說，歷經 1989 年天安門事件的衝擊後，鄧小平所屬意的改革開放路線，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的 23 年間 (1989-2012)，似乎大致實現了其原始所設想的發展模式。在經濟上大量「吸收資本主義一些有用的方法來發展生產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治上繼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堅持共產黨的領導」。2010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1957 年毛澤東所提出的「超英趕美」總體發展目標，似乎即將在 21 世紀上半葉實現。

然而在中國宣稱即將建成小康社會，並逐步實現一百多年來富國強兵的民族夢想之下，習近平於 2012 年初任總書記時的豪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sup>99</sup> 在中共即將召開第二十次全國黨代表大會前夕，卻令人嗅聞到中共內部似乎已在醞釀開始新一輪政策路線轉移並附帶權力鬥爭的不安氣氛。而 2012 年習近平上臺後，諸多與江、胡時代不同的舉措，同樣令全世界的觀察家感到不安。例如接班人問題，胡錦濤在 1992 年中共十四大即進入政治局常委會，習近平則是在 2007 年中共十七大進入政治局常委會，這一實施超過 20 年的制度，目的是讓接班人選制度化。也就是說，下一任的總書記，至少能有一屆至兩屆政治局常委的歷練。然而直至 2017 年中共舉行十九大，習近平似乎未曾安排明顯的接班人進入政治局常委會。

目前第十九屆政治局 7 名常委中，習近平到 2022 年秋天中共二十大召開時，將屆滿 69 歲；李克強 67 歲、栗戰書 72 歲、汪洋 67 歲、王滬寧 67 歲、韓正 68 歲，最年輕的趙樂際也已 65 歲。按照中共十四大以來的規矩，「正國級」幹部滿 68 歲退休，因此理論上只

---

<sup>99</sup> 出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請見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頁 35-36。

有李克強、汪洋、王滬寧、趙樂際四人可以連任，然而四人之中，竟無一看似下一任總書記的態勢。

此外，習近平又藉 2018 年 3 月全國人大開會，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將第 79 條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條文刪除。雖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中，國家主席一職並無實權，然而習近平用意為何，卻相當啓人疑竇。一個合理的猜測，習近平在 2022 年中共二十大之後將繼續連任總書記，如此一來就不會出現黨的總書記與國家主席不同一人的尷尬場面。<sup>100</sup>

當然，這個猜測必須留待 2022 年中共二十大閉幕之後，才能加以證實。

習近平另一個令人不安的舉措，是外交上明顯放棄「韜光養晦」方針，而單獨突顯「有所作為」。隨著中國經濟力量在 21 世紀超英趕美，似乎令習近平在第二任總書記兼中央軍委主席任內 (2017-2022)，不論在國際外交或對周邊區域的軍事恫嚇上，更加明目張膽。而其藉由「一帶一路」倡議，一方面建構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經貿版圖，另一方面則是加深在中亞及東南亞的政經影響力。習近平的國際經貿策略搭配更強勢的外交手段，正引起全球的注意和警惕。

回歸本文主題，即習近平執政 9 年以來，「路線改換」與「權力鬥爭」之間的關係進行式，是否吻合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的歷史經驗？由於相關事實真相諱莫若深，我們只能從習近平上臺前後發生的若干蛛絲馬跡，判斷上述中共黨史的輪迴命運或許仍在上演。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長期以來與習近平競爭黨的接班人的另一名「太子黨」成員薄熙來，突然被以貪污和濫用職權罪名逮捕；不久之後，前任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亦遭拘捕，最終薄、周二人均被判處無期徒刑。周永康的獲罪下獄，是自 1976 年「四人幫」被捕後，第一

---

<sup>100</sup> 自 1993 年江澤民被選為國家主席之後，近 30 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與中共中央總書記基本上皆為同一人。

次有政治局常委（正國級幹部）遭到法辦的事例。此外，同樣發生在中共十八大前夕，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獨子令谷在2012年3月車禍身亡，由於肇事車輛係要價不菲之法拉利跑車，車上另載有兩名女子，此事很快演變成政治醜聞，導致令計劃在該年11月十八屆一中全會並未晉升政治局委員，雖轉任中央統戰部長並於隔年（2013年）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然而2014年底終究難逃撤職查辦命運。由於中共十八大係所謂領導班子「換屆」的權力改組分界點，因此2012年所發生的一連串中共高層弊案，格外引人注目。也就是說，愈是接近權力重組的時間點，中共高層的人事動盪與弊案揭露，也就愈顯得頻繁且富戲劇性。如果從中共建黨百年的歷史經驗來看，這一現象並非偶然，而是必然。

進一步考量2014年至2016年中央軍委前任副主席徐才厚及郭伯雄先後被捕，是否可以說，習近平上臺前後，其實中南海內也發生了驚心動魄的權力傾軋？郭伯雄和徐才厚都在1999年由江澤民授予上將軍階，兩人於2004年江澤民卸任中央軍委主席之前，先後晉升中央軍委副主席，被視為是江澤民留在中央軍委內的「監軍」人馬。結果兩人在2012年習近平掌權之後，分別遭到立案查辦。無獨有偶，2017年7月中共十九大即將召開前夕，曾被視為是習近平可能接班人選之一的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遭到撤職調查。所有這些重大高層人事弊案，似乎都有一共通點，即發生在上文所說的「權力重組時間點」前後。在胡錦濤即將卸任而習近平準備接班的2012年，薄熙來、周永康戲劇性倒臺，令計劃獨子車禍身亡；等到習近平上臺不久，徐才厚、令計劃、郭伯雄一一遭到清算。而後中共十九大召開前夕，原本被看好可能進入政治局常委會的孫政才落馬，讓原本應該組建的接班團隊「順勢」破局，同時也為習近平在2022年「三連任」總書記埋下伏筆。所有這些發生在中共十八大至十九大之間的宮廷鬥爭，時間上似乎太過完美地配合了習近平在2017年之後施政方針及政經路線的戲劇性轉移。誰說中國共產黨百年來「路線轉移／權力鬥

爭」相互伴隨的經驗模式，不能套用於 21 世紀？從 2012 年到 2017 年發生在中南海內部以反貪腐為口實的人事整肅，看到的是「六四」事件結束以來新一波的中共高層權力傾軋；而此一階段政治鬥爭的背景，表面上是習近平勢力的崛起，但背後的政策路線轉移，似乎已預告施行 40 年的改革開放路線，正來到改弦更張的關口。

## 捌、結論

本文回顧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年來的歷次中央路線更迭，目的在與相伴發生的人事傾軋與權力鬥爭相互參照，以證明一旦黨中央的政策路線來到變動更換的臨界點，必然伴隨人事與權力結構的重新洗牌，甚至是血腥的派系鬥爭。其主要原因之一，不外乎中國共產黨係一繼承布爾什維克血統的剛性革命政黨，因此在不同政策路線的競爭過程中，不同派系對於路線制定、話語宣傳，以及政策執行三項權力的取得具有強烈之排他性，一旦某一路線被宣稱為正確，則異己派系及其主張便將立即遭到批判甚至消滅。這在一百年來的中共黨史上，幾乎屢試不爽。從毛澤東與秦邦憲、王明等「國際派」的競爭，到建國後以毛澤東為首的「冒進派」與劉少奇的務實派之爭，再到文革結束後元老派與凡是派之爭，幾乎都循著類似軌跡，直到將對手完全污名化並鬥臭鬥垮為止。

這樣的權力鬥爭模式，即使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路線之後，亦未停止。改革開放儘管高舉某種「務實主義」(Pragmatism) 大旗，<sup>101</sup> 然而對於中共黨內依然擁有社會主義信仰的基本教義派來說，務實主義並非全然中性無副作用的營養補充劑。務實主義者為達成經濟成長目標所引進的經濟、文化、社會，甚至是政治元素，都可

---

101. 改革開放擁護者最常引述的鄧小平名言：「不管黑貓白貓，會捉老鼠的就是好貓。」事實上即為此種務實主義的口語版本。

能一點一滴侵蝕社會主義的純潔性。基於這一認知，1980年代以降中共黨內不絕如縷的左派勢力，依舊對於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政治、社會、意識形態變化小心翼翼。事實上正是這群左派勢力，形成了存在於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背後的某種決定性因素，並在「六四」事件落幕以來的三十多年時間裡，持續召喚針對民主運動加以反撲的社會主義強大幽靈。

從這個角度反思習近平近年來的政策，包括對私營企業的整頓、高倡「共同富裕」、大眾文化方面形似重拾19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的政策，以及在國際間張牙舞爪的「戰狼外交」，在在令人警醒，是否中國共產黨內的某個極左派幽靈，已被習近平喚醒？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意謂著鄧小平所推動的改革開放路線，是否將在中共二十大即將召開之際，也來到某種改弦易轍的臨界點？根據過去一百年的經驗，伴隨著黨的路線改變，相應的權力競逐與派系鬥爭，是不是已經或即將以某種形式展開？

儘管中共二十大尚待2022年秋天才召開，然而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已在2021年11月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成為中共黨史上繼1945年及1981年後，第三份由中央委員全體會議所通過之重要黨史論述。在這份〈決議〉中，為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提出了多項任務目標，包括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國防軍事建設、推進祖國統一、深化改革開放、從嚴治黨、依法治國等等耳熟能詳的官話及套話。嚴格來說，通篇並無真正新意，然而字裡行間持續出現的「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鍵詞，尤其是以「中央委員會決議」為名義將這份〈決議〉與1945年、1981年兩份重要文件相提並列，在在說明習近平已預先將自己的歷史地位朝向毛、鄧兩人比肩。簡言之，習近平搬出中央委員會幫自己背書，以一份向毛、鄧看齊的「黨史決議」，合法化自己繼續掌權的事實，同時也合理化了自2012年以來種種假藉反貪腐為名的政治整肅。



既然習近平已藉由宣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賦予自己在二十大之後繼續掌舵的歷史使命，那麼其在 2017 年十九大以來愈益彰顯的諸多內政、外交、經貿、軍事新路線，顯然只會更加朝既定方向前進，而不會回到江澤民或胡錦濤時代的舊路徑上。這意味著，國際外交方面將不能期待中國外交官的「狼性」會稍作收斂，東亞周邊的軍事安全也將面臨更大挑戰，尤其是臺海局勢。同時，中國內部私營企業的投資環境必將進一步緊縮，這一點六中全會在〈決議〉中已經斬釘截鐵宣示：「黨加強對經濟工作的戰略謀劃和統一領導，完善黨領導經濟工作體制機制」，同時還強調：「支持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習近平正一步步走向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掛帥的老路，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開放政策正遭到逐步校正。〈決議〉裡有一句相當傳神的大白話：「不能簡單以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習近平既然不再看重經濟年成長率，那麼加強黨的領導、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都將進一步削弱私營經濟的活動力。

縱觀習近平近幾年施政路線的移轉，佐證自 2012 年以來中共黨內權力重組的鬥爭過程，再一次呼應了本文提出的論述——中共百年黨史不變的主旋律，就是黨的路線轉移，勢必牽動劇烈的權力鬥爭。按此推論，待 2022 年秋天中共二十大確定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繼續執政，則十九屆六中全會的〈決議〉將會進一步落實為「新時代」的「習近平路線」，這不僅將正式宣告 1979 年以來改革開放路線的終結，而且吾人將有機會拭目以待，新路線、新時代下的中國共產黨，會將中國及整個世界帶向哪裡去。

（收件：2021 年 8 月 5 日；修正：2022 年 1 月 14 日；採用：2022 年 1 月 21 日。）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 專書

- 王年一，1988。《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1982。《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彙編（1952）》。北京：法律出版社。
- 中央檔案館編，199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五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87。《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2。《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3。《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3。《周恩來經濟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6。《劉少奇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4。《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1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

- 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14。《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中共中央辦公廳編，1957。《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
- 中共中央辦公廳編，1977。《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
- 中國統一戰線全書編委會，1993。《中國統一戰線全書》。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 中國國家統計局編，1984。《中國統計年鑒(198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 中國國家統計局編，1993。《中國統計年鑒(199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 毛澤東，1977。《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澤東，1991。《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澤東，1991。《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澤東，1991。《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田增佩，1993。《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朱 德，1992。《朱德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 沈志華，2008。《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運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李志綏，1994。《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李福鐘，1993。《改造一個共和國》。臺北：稻鄉出版社。
- 李福鐘，2018。《世紀中國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臺北：三民書局。
- 阮 銘，1993。《中共人物論》。River Edge, New Jersey: Global

Publishing Inc.。

- 姚 紅，2009。《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 高 華，2000。《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徐達深主編，1994。《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一卷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 徐達深主編，1994。《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 張素華，2006。《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 習近平，2018。《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郭華倫，1982。《中共史論（第一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東亞研究所。
- 郭華倫，1982。《中共史論（第二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東亞研究所。
- 陳一諮，1990。《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陳永發，1990。《延安的陰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陳永發，1998。《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陳 雲，1995。《陳雲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廖蓋農，1983。《黨史探索——歷史經驗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 劉少奇，1985。《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鄧小平，199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鄧小平，199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薄一波，1991。《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薄一波，1993。《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嚴家其、高舉，1990。《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 專書譯著

Daineishi, Balaqi 著，闕思靜、李葉譯，1988。《鄧小平傳》(*Deng Xiaoping*)。香港：南粵出版社。

Kuhn, Robert Lawrence 著，談崢、于海江等譯，2005。《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Vogel, Ezra F. (傅高義) 著，馮克利譯，2012。《鄧小平改變中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

### 期刊論文

王 丰，1995/12。〈鄧子恢與「四大自由」〉，《中共黨史研究》（北京），第6期，頁72-74。

李恒杰，2008/5。〈論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思想〉，《國際關係學院學報》（北京），第3期，頁1-6。

鄧小平，1984/3。〈鄧小平致華國鋒信〉，《匪情月報》，第26卷第9期，頁86。

### 報紙

1952/12/31。〈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稅制〉，《人民日報》，版1。

1976/10/25。〈偉大的歷史性勝利〉，《人民日報》，版1。

1977/2/7。〈學好文件抓住綱〉，《人民日報》，版1。

## 網際網路

中共中央委員會，2021/11/11。〈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 英文部分

### 專書

Chen, Yung-fa, 1986.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ohnson, Chalmers, 1962.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acFarquhar, Roderick, 1974.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pper, Suzanne, 1978.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erry, Elizabeth J., 1980.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wartz, Benjamin, 1951.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lden, Mark, 1971.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eiwes, Frederick C. & Warren Sun, 1999.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Armonk: M. E. Sharpe.

Thaxton, Ralph A., 1983. *China Turned Rightside Up: 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in the Peasant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期刊論文

Frederick C. Teiwes & Warren Sun, 2011/7. "China's New Economic Policy Under Hua Guofeng: Party Consensus and Party Myths," *The China Journal*, No. 66, pp. 1-23.

# **The Party Line and Power Struggles: A Retrospection of the Major Line Struggle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ince the Maoist Era**

**Fu-chung Li**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party lin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shifted frequently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success of the CCP in establish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contributed to the strategy of "encircling the cities from the rural areas," which was developed mainly by Mao Zedong. In order to gain supreme leadership within the CCP, Mao launched the so-called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Yan'an to overcome his political adversarie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C, a series of party line controversies broke out among the CCP leadership over what should be the right way to promote a socialist construct, including, among other things, whether to terminate the New Democracy policy and the struggle between "Rash Advance" and "Opposing Rash Advance." This path accounts for the disaster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prepared the field fo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new round of power struggle broke out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rom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launched in 1979 through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CP later this year, the shadow of line disputes and power struggles lingers and reminds us that



as a Bolshevik revolutionary party, the CCP's party line and the power of discourse always have to be shifted at the price of fierce power struggles.

**Keywords:** Mao Zedong, New Democracy, Anti-Impetuosity, Deng Xiaoping, Xi Jinping